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八八期 ——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7e)

【研究报告】论造反派(下)	何 蜀
【史海钩沉】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上)	徐海亮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报告】

论造反派(下)

• 何 蜀 •

(六) 力图改变“政治贱民”地位的人

这类人“文革”前社会地位低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家庭出身”问题，本人“政治历史”问题，或本人“现实表现”问题而遭到压制、打击，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其中有被强迫“劳动教养”、“劳动改造”释放后的人员（在当时社会上通常仍称之为“劳教释放犯”、“劳改释放犯”，仍以罪犯视之），有被单位开除、降职、降级或下放的人员，有长期不予安排正式工作或难以找到正式职业的人员，有因农村遭遇大饥荒而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员，有长期受到歧视、压制的“反属”（“反革命”等各种“专政对象”的家属）等等。

在遇罗克之弟遇罗文所著《我家》一书中，就写到了当时一度占据着北京市人委大楼的一些无家可归的“遣返人员”（撵回农村的“黑五类”又被农民撵回来，原来城里的住房已被别人占了），“起初他们常遭‘红卫兵’洗劫、毒打，求生本能使他们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十六条捍卫团’，专门对付野蛮的‘红卫兵’。”（48）

在四川省1967年的“二、三月镇反”中，在成都首先遭到打击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在重庆首先遭到打击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前哨（临江门街道）支

队，其成员中就有不少这类人员。这些人一般在1967年的“二、三月镇反”之后就已明白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是难以改变的，“公安六条”列出的“二十一种人”已经把他们大多网罗于内，因而他们大多退出了“文革”舞台。

（七）想要争取一些自身权益的人

这类人与前面一类人有些交叉，同属社会弱势群体。不过，这类人更多的是想从经济角度解决一些自身权益问题。如感到待遇不平等的合同工、临时工、轮换工、外包工，“文革”前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被精简下放的城镇职工或被遣送到农村的城镇居民，“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边青年、支援内地建设职工等。

他们在“文革”中的造反，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主要是进行经济斗争，要求得到平等的经济待遇，或要求转正（转为正式工），要求复工、复职，要求返城（重新获得城市户口和粮食关系）等等，表面上的政治口号只是一个适应形势的合法手段。因此他们在整个造反派阵营中显得十分“另类”，特别被一般理想主义型的造反派看不起。

这方面，较有影响的，有在北京建立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有上海的临时工、外包工组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还有打着“全国”旗号的全国上山下乡革命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等。他们的造反在1967年1月达到高潮，但也迅速被压垮，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很快便发现不能容许这样的“造反”，而以“反革命经济主义”等罪名将这类组织予以取缔。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宣布对“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接着，2月17日一天之内，中央就同时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等文件，将这一股以经济目的为主的造反风强压下去。而首都三司等号称是“中央文革铁拳头”的主流造反派，则在打击这些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组织时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

（八）以造反为好玩者

对这类人和这种纯为“好玩”而参加政治运动的社会现象，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其实这也是大量存在的事实。相当一些人，特别是不少政治意识淡漠的青少年，参加政治运动并非出于理想、信仰或挨整后的报复欲望，而仅仅是为了“好玩”。因为社会生活的日益政治化，他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正常的健康的娱乐条件和机会，从小就只知道玩“捉特务”、“打仗”、“抓俘虏”之类游戏，到“文革”爆发之前，社会生活的枯燥乏味已经达到了极点，稍微好看一点的书和电影、戏剧、美术作品，好听一点的音乐，都遭到了批判、查禁。“文革”造反风起，社会陷入半无政府状态，他们可以“自由”地玩耍了，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玩耍，只会仿照以往从“革命教育”中获得的那点“知识”来满足自己玩耍的天性，于是，他们快活地参加批斗会，快活地参加武斗，甚至快活地参加虐囚、虐待，甚至“打活靶”（以路上行走的活人为靶子比赛枪法取乐）……

重庆电视台编剧张鲁在《红卫兵武斗忏悔录》一文中回忆了他亲见的一次虐待活动。这些俘虏并不是武斗中抓到的对立派人员，而是当时一伙“社会上的”（不在任何群众组织派别中的）打架斗殴者。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红卫兵武斗队以重庆市中心区的治安警察自居，得到群众举报后持枪跑去把那伙正在斗殴的人抓到了学校，然后，“也不审也不问，就说，你们不是喜欢打么？就打嘛。于是命那两拨人就在大操场扯开架势打。哪还敢打？就说，不打？老子

好久没打了，今天倒要看下子你们是咋样一个打法的，也算过个瘾。那帮人还是不敢打。就又说，好嘛，不打群架，那就单练。就将两拨人一边喊出一个来，发了刀刀棒棒，单练。还是不敢。就喊其一趴下，令另一举棒打去。这一位不敢打重了，看起没劲，学生中就有一人悠悠从观战者一群中走出，伸出两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从此人手中要过棒棒，拉开过去衙门打板子的架势照趴着那位一顿痛打，打毕，把棒棒交回站着的人手上，伸出两指推推鼻梁上的眼镜，悠悠回到观战者一群，活像体育课被老师叫出队列投了一回篮又回到队列。就问那人，这下学会没有？那人连连应声，会了会了。举起棒棒要打。但有人说，打学会了，该学挨了。于是就换了趴着的那位起来，命这位趴下，趴着的那位自然将这顿痛打的怨气全发泄在这位身上，棒棒舞得比眼镜更圆。于是这两拨人打了又挨挨了又打，直把个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大操场打得来噼噼啪啪妈啊娘的响声连天。这还不算，又有人想出点余兴来，叫这两拨人‘大联合’合二为一列成方阵表演当时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流行歌舞《车水忙》。直到此时我才觉得这伙五大三粗的汉子真正可怜，他们五大三粗五音不全身带棒伤还要学女学生扭腰摆臀载歌载舞：‘车水忙，车水忙，脚踏水车喜洋洋，水过清渠哗啦啦响……’”（49）

笔者也曾于1967年秋听一个从重庆跑到成都的反到底派武斗人员，一个中学生，讲他们如何逼八一五派的俘虏跳《车水忙》的事：不跳的，或者说跳不来的，就用棍子打脚，逼得其非跳不可，俘虏中有一人是跛脚残疾人，“自报节目”说跛脚不好跳，唱一个歌给你们听要不要得？获准后，那跛脚俘虏便临时根据“文革”前的流行歌曲《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编了个讨好的歌曲《反到底人民要解放》唱起来：“反到底人民要解放，革命烈火越烧越旺，烧得那个伪革联心惊胆战。从军工井冈山到西师八三一，从造反军到财贸九二一……”把反到底派的知名组织都编进了歌里。于是得到赞赏，免遭“触及皮肉”。我至今还能记得那中学生讲述这一虐待活动时乐不可支的样子。

（九）趁火打劫者

这类人，在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动乱或政治运动中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就像阿Q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时便想跑到赵太爷等大户人家里去“革命”发财，抢一点“元宝，洋钱，洋纱衫”及“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居然认为阿Q的这种行为也叫“革命”（这与毛泽东充分肯定并热情赞颂湖南农民“痞子运动”是一个道理），毛泽东曾在讲话、谈话、报告和著作中多次提到“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事，“教育全党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准许别人革命”（50）。因为毛泽东反复使用这个不伦不类的例子，一般人也就习惯于认定阿Q抢东西也是“革命”，“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是不对的。

“文革”中，1967年1月20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上海《文汇报》1月14日社论《沉舟侧畔千帆过》中，就以此为例说：“那种相信没有他们就不行了的人，除了自己不敢造反外，还不准别人造反。这是《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作风。在文化大革命已深入开展的今天，新假洋鬼子们可以休矣！”

《人民日报》也在多篇文章、社论中以此为例来教育造反派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如《人民日报》1967年6月21日发表的《团结——批评——团结》中就说：“在那篇《阿Q正传》里，鲁迅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有个留过东洋的地主少爷叫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阿Q想到假洋鬼子那里参加‘革命党’，却被他扬起哭丧棒赶了出来。其实，阿Q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也还是不准。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难道能够像假洋鬼子那样吗？”

既然毛泽东都认为像阿Q这样的“抢点东西”也叫“革命”，那么在“文革”中这种人也就自然不会缺少了，进城参加武斗的农民中这类人较多，为了得几个工分，得几块钱，或是在打

砸抢中顺手牵羊发点小财，他们有的人就把命丢在了城里。

重庆市文联当时的业务组组长杨世元（后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离休干部）回忆，1967年2月，在重庆市文联造反、夺权的作家罗广斌被对立的八一五派绑架后，一伙“文革”前的业余作者和业余文艺活动骨干打着“四川省工农兵文艺兵团重庆团”的旗号到文联来进行第三次夺权（第一次是市委工作组夺文联党组的权，第二次是罗广斌、杨益言为首的文联造反派夺权）。来的人当中，就有人主要是想找“禁书”，而且主要是想找原版《金瓶梅》，甚至在私下里声言：“要骚大家骚！”〔51〕

以上所提到的，只是当时占造反派主体的几种较为常见的类型。这些类型也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常有交叉，有的人同时兼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身份，在有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中，此一类型人物占主导地位，而另一些造反派组织则可能是彼一类型人物占主导地位。各种类型的人物在不同部门或地区的造反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不可一概而论。此外，对于在那样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出现的历史人群，必定还有其他一些千奇百怪的类型混杂其间，也还有一些作为造反派基本群众的“随大流者”，但是他们都不可能在造反派中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 造反派的时代烙印

造反派这个出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的特殊群体，虽然其组成人员形形色色，加上因“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而显得全国各地千差万别，但是毕竟同属一“派”，而且生活、成长于同一时代，不能不在思想、行为等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烙印。不正视这些时代烙印，就很难正确认识和评价造反派。

（一）“怀疑一切”与个人迷信

“怀疑一切”是对“文革”前日益强化的思想禁锢的反弹，是社会政治生活从“听话要听党的话”突然变成“自己解放自己”的大转折时期必然出现的现象。“怀疑一切”思潮在造反派形成之初达到顶点，当时造反派最常引用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就是：“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因此，造反派敢于对许多权威进行怀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几乎都遭到造反派的怀疑和“炮轰”，甚至连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连周恩来都难逃被怀疑、被“炮轰”的命运。

但是，造反派的“怀疑一切”并不是什么都不相信，并不是真正的“反权威”，因为他们同时又非常迷信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所写的《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1966年9月7日）一文中说：“怀疑一切，就是用毛泽东主义检验一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论“怀疑一切”》（1966年10月11日）中也说：“‘怀疑一切’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检查一切。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相信、就拥护、就支持；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批判、就斗争、就坚决打倒！！”〔52〕

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表现？造反派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迷信。造反派深受时代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青少年，更是在个人迷信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这方面的思想烙印更深。因此，造反派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为己任。而且在以后的发展演变中，往往在个人迷信方面表现得比一般民众更加狂热，更加极端。重庆造反派的两大派，八一五派一开始就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后来分裂出去的反到底派，也有一个更加响亮的

口号：“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反到底派还专门设有一个影响极大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学生领袖江海云，在1967年“二月镇反”中被抓进监狱后，她在向公安当局抗议时宣称：“我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死作毛主席的红小鬼！”在狱中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出狱后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说是“毛主席救了我”，要大家“一千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53）。

从当时不少造反派新改的名字也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卫东”、“卫红”、“永红”、“继红”、“红兵”、“文革”、“造反”、“反修”……都是当年红卫兵、造反派甚至普通民众中常见的名字。湖南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的领袖叶卫东，原名叶冬初，长沙市第一中学教员，共青团员，为表示“保卫毛泽东”的决心改名叶卫东（后曾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武汉“钢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学生领袖杨道远，原名杨树贵，武汉测绘学院航测系学生，“四清”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因受那段流传甚广的有关这一代青年人“任重而道远”的“毛主席语录”影响，改名杨道远（后曾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西有位工人造反派、柳州铁路局“工机联”的负责人王某，为表示“紧跟毛主席反修防修”而改名王反修，在1968年7月25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时，周恩来曾质问他：“你叫王反修？你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不是王反修，是忘记了反修，是忘反修！”（54）

（二）缺乏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

因为在“文革”前长期生活在不讲法制、《宪法》形同虚设的社会环境中，造反派与当时的官员和民众一样缺乏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缺乏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在这方面，造反派与1957年的许多右派相比，思想上矮了一大截，首都三司著名的口号“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扫帚”，就跟“文革”前宣传的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要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有异曲同工之妙。造反派普遍的行为准则是毛泽东讲的话，《毛主席语录》，以及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首长讲话”。本来造反派都反对“血统论”，但只要中央文革小组一宣布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大毒草”，造反派马上就群起而攻之，积极查封发表《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各个小报、组织不仅仅限于文字的围剿了，原来零星的砸、抢变成了大规模的行动，谁越过分越显其‘左’得‘可爱’。”（55）本来临时工、合同工的造反组织与其他造反派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但中央文革小组一宣布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红总”是在搞“反革命经济主义”，首都三司马上出动人马对“全红总”进行围攻、抄砸。几乎没有什么造反派把《宪法》当作行为准则。即使是在建立群众组织方面，也不是依据宪法而只是依据中共中央的有关规定。一旦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让群众组织存在了，造反派无不纷纷表示拥护，自动撤销总部，解散组织，还自认为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是舵手，造反派跟着走”。

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女学生的思想。一个是“反右派”时期的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冯元春，一个是“文革”时期的四川大学数学系学生江海云。冯元春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之一，是她对中共党内的“高饶事件”提出了质疑。她认为，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冯元春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还会是什么？”冯元春的观点是，高、饶没有反人民，他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56）比冯元春晚将近十年的川大校友江海云，“文革”中著名的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的“政委”，在1967年“二月镇反”中因“冲击成都军区”等罪名被公安机关抓捕，4月里获释后，她在群众欢迎大会上的讲话中控诉说：“在狱中，他们对我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甚至没有学习毛主席语录，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自由！”“我原来就想不通，为啥子要抓我呢？现在才搞通了，因为我要革命，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他们就要镇压。这些道理都是毛主席早就告诉了我们的，我也饱

饱地尝到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味道，深深地懂得了，如果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要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57）冯元春能站在公民的立场来看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作为是否合法。而江海云则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灌输的那些教条在看待社会。

（三）“大民主”与不民主

“文化大革命”中宣称实行的是“大民主”，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民所不可能享有的最大的民主。其实这只是一种“民主”的假象，所谓的“大民主”是没有法制保障的虚假民主，只是毛泽东“运动群众”的一种手段——毛泽东从来就认为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长期接受的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育、影响，长期接受的是“阶级斗争”教育，被灌输的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和“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反对折中、公允、调和”等思想，造反派普遍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因此在大字报、传单、小报和广播中经常出现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或对批判对象进行人身攻击、乱加罪名无限上纲的内容，在批判时总是要剥夺对方的发言权、辩护权，甚至施以武斗或私刑，随意抓人、抄家。有人认为造反派进行的是“争人权”的斗争，实际上当时的造反派根本就没有现代意义的人权意识。造反派大多在“文革”前或“文革”初期遭受过迫害，但在起来造反后往往会对批斗对象进行变本加厉的打击迫害，丝毫不会认为对方也有“人权”。比如众所周知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斗争王光美（逼其穿上旗袍，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进行丑化），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斗争彭德怀（先后七次将彭德怀打倒在地，致使其前额被打破，胸部两根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首都军事院校造反派斗争罗瑞卿（将跳楼自杀摔折了腿的罗瑞卿用箩筐抬进会场），以及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山西省省长卫恒等被批斗整死……造反派普遍不懂得宽容，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对“保守派”批判当权派，造反派总要称之为“假批判真包庇”，对当权派的检查，造反派总要称之为“假检查真反扑”。也正因为如此，造反派内部往往因一点小小的意见分歧就会上纲为“原则斗争”，就要“炮轰总部”，甚至拉出人马分裂为势不两立的派别。造反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除去早期的基层组织外，也大多不是真正通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后来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群众代表，更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些头头们的重大决策，也经常不通过民主程序讨论表决。一些重大行动往往就是一两个或几个头头作出决定后便调动人马付诸实施。重庆反到底派的一号勤务员李木森回忆了当年他们两个负责人秘密决定搞一次卧轨抗议行动后，就把成百上千的群众用汽车拉到预定地点去，而这些群众对去干什么毫不知情……他还回忆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在四川两大派为省革筹小组的两位干部刘结挺和张西挺应该打倒还是保卫（“打刘张”和“保刘张”）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重庆反到底派举行“保刘张”的大游行，他所在工厂有老工人不辞辛苦走很长的路跟着参加了游行，但事后有人问起刘、张是男是女都不知道。（58）这类事例在派性冲突中数不胜数。

（四）暴力倾向

因为长期接受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造反派信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因此在语言和行为上都带有强烈的暴力倾向。“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都是当年造反派的流行口号。很少有哪个造反派组织没有参与过打、砸、抢活动，虽然打砸抢不是造反派的发明，而是从土改时的“贫农团”，三反、五反时的“打彪队”直到1966年“红八月”制造“红色恐怖”的早期红卫兵之类历次政治运动积极分子那儿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但却被造反派毫不含糊地学到了，用上了。造反派两大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容易就发展为暴力冲突，甚至升级为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在武斗中，都把对方称作“匪”（就像国内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互称为“匪”一样），而把自己的武斗行为说成是“剿匪”，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因此在武斗中许多地方都有虐

俘、杀俘之类事件发生。电影导演陈凯歌还对这种暴力倾向作出了另一种反思，他认为当时许多人使用暴力是出于恐惧：“‘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他还坦率地回忆了一次在游泳池参与中学同学对一个“流氓”进行群殴的事，“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觉察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59）

当然，造反派的这些时代烙印，有的（如个人迷信、缺乏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民主、暴力倾向等）在“保守派”以及当权派那里都可以看到。只是表现形式及内容各有不同特点。时代的烙印决不会仅仅青睐同时代人中的一部分。此外，这些时代烙印也并非“文革”时期的赐予，而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对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作另一些探讨。

通过上述回顾与分析可知，把造反派这个复杂的历史概念简单化，无论是称之为“社会渣滓”还是“人权斗士”，都是不科学、不准确、有违历史事实的。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比如，对各省、各大城市、各大地区主要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形成、发展、演变和消亡，对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两大派或三派的头头，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中共九大、十大的代表，出席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的个人情况，对各地重大的造反事件的发生背景和来龙去脉等等，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更进一步，还可以深入调查造反派的代表人物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年龄、性别、民族、籍贯、文化程度分别是什么，他们中有多少共产党员，多少共青团员，多少转业军人，多少劳动模范或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们中不同年龄层次的各占多大比例，他们中有多少人在“文革”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什么时间加入的，什么人介绍的（比如，湖南省著名的工联负责人胡勇，就是由华国锋和支左部队一位领导人介绍在“九大”前夕“突击入党”的（60）），他们中有多少人在“文革”中就被判刑入狱，有多少人在“文革”后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党政职务，有多少人被判刑入狱，有多少人被定为“三种人”，他们的具体罪名是些什么，他们在“文革”中和“文革”后被定的罪名有哪些不同，这些罪名涉及的史实如何，他们中有多少人后来在新的领域做出了成绩，等等，等等。

总之，对造反派，还需要有更多、更全面、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不会像盲人摸象那样，只摸到一根象尾巴或象鼻子，甚至可能只是象腿上的一团烂泥，就急着下结论说：这就是大象！

注释：

1. 王年一2006年1月7日致笔者信。
2.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592—593页
3.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7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4.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5. 陈毅对外事口运动的指示，1966年6月25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118页。
7. 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283—284页。
8.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88页注释3
9. 清华附中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10. 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87页

- 1 1. 这句话是毛泽东亲自“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之一。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212页。
- 1 2. 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上册，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版18—21页
- 1 3. 安文江《我不忏悔》，见《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版93页
- 1 4.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323页
- 1 5.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66·5—1991·12）》下册，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7页
- 1 6.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298页
- 1 7.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378页。
- 1 8. 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柳萌主编《在劫难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140页
- 1 9. 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柳萌主编《在劫难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139页
- 2 0. 徐友渔《蓦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第一版90页
- 2 1.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 2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209页
- 2 3.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 2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247页
- 2 5. 以上中央文件当年均公开发布，现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2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305页）
- 2 7. 以上中央文件当年均公开发布，现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2 8. 1967年4月30日周恩来、陈伯达等接见福建群众代表时，周恩来讲话说：“对姜观有很多材料说明确实比较严重，所以不要马上作结论。台湾的报纸喜欢他的东西，说明他是在被敌人利用，他的问题还待查明，一般应立即释放。”“姜观的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将继续研究，将来还派人去，再把意见提供给军管会。”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2 9.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385页
- 3 0. “七二三布告”与“八二八命令”当年均在全国公开张贴、宣传，家喻户晓。现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3 1.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74页
- 3 2.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130页
- 3 3. 《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第一版210页。原文中“那是我17年以来全部的教育……”里的“17年”为“17岁”，应为排版错误。
- 3 4. 见《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1页，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教学批改组、外国留学生工作批改联络站、首都红代会北京语言学院红旗兵团编印，1967年6月。
- 3 5. 武光《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61页
- 3 6.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209页

37. 张鲁《红卫兵武斗忏悔录》，载《红岩春秋》杂志1995年第一期
38. 《毛泽东思想的一曲凯歌 / 记我们身边的麦贤得——董继平同志》，载《8.15战报》第42期，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主编，1967年10月1日出版。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319页
40.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第一版115页
41. 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花城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89—98页
42. 周孜仁2006年1月2日致笔者信。
43. 一丁《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载华夏文摘增刊355期·文革博物馆通讯172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2003年4月8日出版
44. 邓自力《坎坷人生》，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236—237页
45. 《胡耀邦传》第一卷（1915—1976），主编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唐非撰，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398页
46. 《陶德坚回忆录》，见《五柳村》（陶世龙个人主页）
47. 《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第一版201页
48. 遇罗文《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81页
49. 张鲁《红卫兵武斗忏悔录》，载《红岩春秋》杂志1995年第一期
50. 徐中远《读鲁迅著作》，载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9月第一版188页
51. 杨世元回忆、何蜀整理《“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未刊稿
52.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53. 《坐牢杀头何所惧 誓死保卫毛主席——江海云同志在热烈欢迎我非法被拘捕战友胜利归来大会上的发言》，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队主办《八·二六炮声》第六号，1967年4月14日出版。
54.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55. 遇罗文《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98页。
56. 谢泳《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载《谢泳居》网页。
57. 《坐牢杀头何所惧 誓死保卫毛主席——江海云同志在热烈欢迎我非法被拘捕战友胜利归来大会上的发言》，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队主办《八·二六炮声》第六号，1967年4月14日出版。
58. 李木森《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未刊稿
59. 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柳萌主编《在劫难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157—158页
60. 叶长青、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网站。

写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前夕

2006年3月16日第二次改定

2006年3月31日第三次改定

~~~~~  
【史海钩沉】

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上）

• 徐海亮 •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下榻东湖宾馆，试图就地解决湖北武汉文革的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共中央处理运动问题的精神，武装冲击武汉军区和中央来人下榻的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形成在文化革命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〇事件”。中共中央对此事件做出严肃处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提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

毛泽东、周恩来在世之时，尽管文革司令部内部出现系列重大人事变动，1972年，一度靠边赋闲的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治委员钟汉华也被重新起用，但是中共中央对于“武汉事件”的定性一直没有改变。

毛泽东、周恩来去世以后，文革被全盘否定。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彻底平反；该报告称：“‘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本文从历史的实际过程，记述40年前震惊中外的“武汉事件”。

1967年7月13日下午，北京。

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萧华、杨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并对全国各地运动形势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要到长沙、武汉去看看，准备在武汉游泳。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游泳；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周恩来决定派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会后，周恩来又电正在四川重庆的谢富治赶到武汉“负责主席安全”，谢请示要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力金，和随行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同行。周当晚即飞武汉打前站，安排毛泽东住处。王力回忆毛泽东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1〕、〔2〕

此时，武汉文革运动的问题并没有讨论和定性；13日中央最高决策碰头会上，没有具体谈武汉的问题，更没做结论，毛泽东只说去武汉做调查研究。会上谈了一些原则问题和人事安排。实际上，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也从来没有对武汉问题进行过正式研究，只是在6月发生激烈的武斗时，商议发一个文，制止极不正常的武斗，由杨成武和戚本禹共同草拟了6月26日给军区的电话指示，周恩来、陈伯达知悉。〔3〕

在此之前，毛、周已经商议南巡和解决武汉问题；7月7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林彪一起接见出席解放军会议的代表，在6日和9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周在10日立即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周恩来电令谢富治到汉，除了他身为副总理、公安部长外，也由于武汉地区驻军的一部分，原为解放战争期间陈（赓）、谢兵团的老班底。老陈、谢兵团的9纵，1949年改编为第15军，也即1967年在应对武汉非常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空（降兵）15军。

中央警卫团当事人今天回忆〔4〕：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之前，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要外出，并就外出的警卫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汪东兴同志在向我们传达布置任务时就指

出……这次又是文革以来毛主席第一次外出，他要大家要有足够的认识与准备，……他还特别指出，要我多带些部队……足见这次任务非同往常，有可能遇到艰难和危险。看得出，毛主席是有这种估计的，而且也是做了准备的。

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再含等一行6月底去云南时，并无武汉的任务，中央文革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也没有做解决武汉问题的准备。谢、王一行人7月13日刚刚到重庆；当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务必14日赶到武汉执行任务，也未说明是什么任务。

#### ◇ 毛泽东和周恩来亲临武汉

14日凌晨，周恩来、李作鹏离京，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武汉空军刘丰副司令员、萧前政委前往机场。周抵武空司令部，叫刘丰通知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去空司。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军先行接了总理，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周恩来一见到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就向他们告知对于武汉情况的态度；钟政委后来检查说：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一边。陈再道也证实过这一事实。

周恩来指定刘丰负责安全，从而，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毛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又把东湖宾馆内梅岭一、二号的8201（湖北省军区独立师）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这一举措本来属于规范惯例，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不满意，北京来人发现，他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

尽管中央在北京从未正式谈论武汉问题，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武汉形势心中有数，抵汉之前，已经有一个基本倾向和态度。

14日中午，谢富治、王力、余力金等自重庆、成都抵汉口，海军政委李作鹏接机，一行人到东湖客舍，周恩来立即接见了他们。下午，周召集东湖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两派群众负责人开会，提出：1，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2，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3，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周批准。同时，也把宾馆的工作人员做了调整，原来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换成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钢工总”的。晚上，周与三军领导，谢、王一行开会时，随毛泽东同行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来到百花一号；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已经到达，立即赶赴毛的住处梅岭。

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三军领导，带来了三军作战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的微行南巡，架设了电台，建立了“前指”。

深夜，王力、谢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接触到造反派学生。见了北京来人，在场群众眼泪哗哗直下，消息迅速传开，湖北中医学院群众组织“红三司”也刷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周总理听说消息业已传出，当机立断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并布置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谢、王也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

从东湖宾馆看，虽然警卫有所调整，但是整个宾馆大院仍由8201部队负责保卫，大门由他们看守，并没有调换警卫人员，中央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仅仅密切控制了毛泽东和8341驻扎的梅岭1、2、3号一片建筑和附近树林、要道。15日，军区保卫科王振英科长和孔庆德副司令提出建议，即用8199部队（陆军第29师）来加强宾馆警卫，但钟汉华政委没有

同意。

◇ 毛泽东对武汉问题的基本态度，周恩来做军区的工作

7月15日上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关于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并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造反派“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中央首长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15日后，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等和军区领导曾反复去江边踏勘，策划游泳事宜；周恩来和谢、王等都是上午在毛泽东处汇报，下午，听取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汇报。

16日，毛泽东明确“工人总部”要平反，先把几个被军区抓捕的头头释放。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次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谈到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5〕

王力回忆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不难。湖北有可能要先进些。‘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对于武汉军区，毛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样……”。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下一道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6〕

连日的汇报会议上，陈再道对于周恩来讲的基本意向十分不通，虽然周在17日已建议毛泽东次日接见军区领导，当晚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做工作，可是陈再道并不知周恩来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而且毛泽东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他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他还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陈再道直接冲撞周恩来，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甚至指着周在18日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周恩来气得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7〕

军区支左办公室后来揭露出当时的实情：“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

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的很”。〔8〕

陈再道自己在1967年12月的检查，也谈到：“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他后来回忆〔9〕：“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

不过，18日总结会议后，周恩来带陈、钟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再次讲了解决问题的原则。毛泽东接见有关人员，宣布中央对武汉的态度，对周、谢、王、余，李作鹏、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等谈到：为什么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也谈到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也夸奖了钢工总在水利学院修筑的自卫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

该会明确了关于军区支左、造反派、“百万雄师”问题的三条基本方针。陈、钟在主席亲自指示和安抚下，接受了批评，表示要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工人，做部队的转弯工作。周恩来在毛泽东接见之后，连夜就回北京了。陈、钟亲自去释放了被拘禁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朱鸿霞和胡厚民；并让军区按中央指示精神修改、印刷检查的公告。

#### ◇ 武汉群众的反应和社会实况

15日这天，武汉造反派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名义组织大游行，队伍里也打出了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王、余的标语。各高等院校的喇叭，播放了《毛主席派人来》高亢激越的歌曲。与此同时，“百万雄师”硚口区三分站等候总站命令，于12时，在武胜路电车公司埋伏的“百万雄师”冲击游行队伍，发生武装冲突；区站指挥专业武斗队“雷达兵”、“闪电兵”、“霸王鞭”、“翻江龙”、“铁臂摇”等几十车“百万雄师”发起进攻，致伤工人学生多人，“新华工”工人李长亮等伤重致死。双方冲突到下午终止。此外，郊区农民造反派在水利学院举行控诉残酷镇压群众运动大会，造反派数万人在青山游行，抗议“百万雄师”迫害一治革代会负责人。是日，“百万雄师”组织约800人横渡长江。

当晚，谢富治、王力到喻家山华中工学院看“新华工”大字报，和学生、工人座谈；要求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要求收缴武器。说：“王力同志向你们领导人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个建议，我们坐下来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著作……要运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尤其是自我批评。我们今天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你们，同时带来了两点要求……”。王力接着讲话，强调：“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主流是什么，不能够抓不住主流，不能让支流牵着我们鼻子走。这就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同志们统统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第一条立即停止武斗。根据中央的六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应该保证执行这个六条。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应该达成这个六条的协议，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使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对于中央来人，“百万雄师”高层，在内部存在两种意见，一是按原来准备的材料汇报，希望扭转中央对于武汉形势的看法，另一个是“鹰派”——包括盲目主张武斗解决问题的人，和认真冷静分析了全国形势的人，他们对于中央是否会倾向于“百万雄师”，已经毫不乐观，失去信心（他们在中央来人之前就有报告分析了前途，警告了高层）。他们倾向于公开的反抗和斗争。7月16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前往硚口区3506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态度十分冷淡。谢劝诫他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怎么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的名单；王力批评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不耐烦地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百万雄师”头头顶嘴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王力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立即停止武斗；2.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撤除所有的工事；4.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说完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和骨干，对谢、王的态度与话语十分不满，情况次日即传到“百万雄师”基层。

“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回忆（10）：“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谢、王到3506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后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不论回顾是否仍带有情绪，会见的结果是谢、王丢失了缓和其情绪的唯一机会；尽管此时群众还不知道周恩来15、16日批评军区的讲话精神，但已经十分清楚：由谢、王等中央文革要员代表中央处理问题，决不会倾向保守派的。

按照毛、周意图，中央的代表充分听取各派意见，调查研究，做好“百万雄师”的思想转弯工作；“百万雄师”个别头头也设想改变中央印象。但16日深夜的初次会见，问题变化得更僵持，“百万雄师”下决心抵制谢、王，群体性的反抗势在必然，中央来人不得不再次面对“百万雄师”做疏导工作，已是兵临城下之时。

16日，为纪念毛泽东横渡长江一周年，武汉造反派组织了大型的渡江活动，是日，没有发生两派的冲突，汉口“百万雄师”广播站，甚至还对游行的学生，发出“向革命小将学习”的友好呼声。从17日起，各大专院校造反派按谢富治的要求，开始陆续集中和封存自制长矛。

18日凌晨，谢、王前往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钢二司司令部，与学生座谈，要求收缴武斗器械，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要坐下来学习，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日凌晨，谢、王前往工人和学生造反派“逃难”集聚的武汉水利学院，向在场的五千群众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王力强调：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并激情地表示“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武汉空军的刘丰与萧前（政委）也在大会上诚恳表态，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

欣喜若狂的一些造反派把大会录音拿到武汉三镇播放。省直造反派的头头郑军现在回忆：我们把录音拿到洪山路湖北饭店，对着省委用高音喇叭播放。这一下大概坏了事，当天晚上 8 2 0 1 部队和“百万雄师”的人，就冲到东湖宾馆抓了王力……

#### ◇ 部队对立情绪的酝酿形成

但是，在毛、周来到武汉前，思想上僵持对立的局面早已酝酿、形成。问题主要在部队。

陈再道后来在检讨中承认：“7月9日（军区）常委会定调子，7月10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么！‘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

实际上，“工人总部”是否反革命组织，是否应该和必须平反翻案？是一个极其尖锐敏感的问题，造反派极为平白又刺激的政治口号“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是言简意赅的，军区主要领导、“百万雄师”的头头都认为“工总”一旦命运逆转，将是他们政治失败的标志。

省军区独立师深深卷入运动，他们对于公检法军管、逮捕造反派、顾问并支持“百万雄师”武斗，负有具体责任，对于即将到来的所谓“摊牌”——决定自己支左工作的路线是非和“政治命运”，精神十分紧张。其领导和军区的一些中层干部，也分析了全国情况，对于即将到来的情势，并不乐观。独立师领导详细传达了军区会议精神，并讨论了三天，指示各团根据所统一的口径，组织讨论、统一认识。

思想上的冲突其实早在 5、6 月就已经形成与积聚，总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6 日，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署名的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不言而喻，“百万雄师”按照传统思维把谢、王看成脱离工农兵大众的“钦差大臣”，而造反派学生则是“臭知识分子”。

17 日，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散布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又说“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这个典型意见，已天才地预见了未来事变的端倪。

19 日上午，军代表张某在汉口对“百万雄师”头头讲话：“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

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做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11）这些动向，反映出部队对于全国形势认识，对中央文革十分疏离；担心形势将不利于武汉，担心“犯方向路线错误”。

实际上，通过各种渠道，他们收集研讨了内蒙、成都和河南军区的问题，研究了中央的态度，对解决各地所谓“保守派”的方针政策，表示极不理解和极其不满。当时最担心的是走四川、内蒙、河南的道路，这些忧虑立即以大量对抗性言论、标语——甚至谣言表示出来。

#### ◇ 7月18日周恩来的总结讲话

1967年的“武汉事件”前夕，最为关键的是周恩来在7月18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是军区连续几天会议的总结讲话，也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正式、基本态度；讲话稿由周恩来在东湖亲自拟订，且由毛泽东在17日看过。

在军区的会议上，周恩来讲：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12），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13），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14）。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推迟时间来解决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方向走错了。“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像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15）。

“‘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16）。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17）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



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18）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19）。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按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20）。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21）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按：这里点的“中间偏保派”）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22）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23）

最后，周恩来说：“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从史实和本质看，当时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独立师主要领导，以及“百万雄师”极其抵触，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实际上正是周恩来的这一席讲话，他们非得要谢、王确认和澄清的正是流传出的所谓“四点指示”（公正地说，“百万雄师”在宾馆最先是要求谢富治澄清这个指示，而非找王力）。所以周恩来21日在东湖边对北航红卫兵井岗山同学讲：“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24）25日，他对河南省的军队干部也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

应该说明，独立师的肇事者在19日开始抓住王力发难，并非王力自由散漫、“党性不高”——错误地在周恩来身后向群众透露了周的讲话精神；到军区和街上闹事人极端反感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周恩来18日讲话的核心实质。这是发生反弹的一个最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时值40年后的今天，“百万雄师”上层的朋友们是心知肚明的。

◇ 周恩来讲话精神被泄露，群众情绪被挑动激化

按照军区会议的规定，周恩来对师级干部的讲话内容需保密，先不要向下传达。

但是，讲话精神在18日当晚就被泄露了，总理刚走不久，钟汉华政委即同意在独立师传达，后又迅速传到社会上。对于这点，钟汉华后来检查（25）这样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

18日晚独立师常委研究决定，19日上午向各团级干部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实际上，当夜会议精神就由蔡政委传达到独立师机关团级干部，次日又扩大传达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部队听传达，并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从决定在8201部队团级干部传达，到武汉群众听说“四点指示”，不超过20小时。事实是：18日深夜会后，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蔡炳臣家，第二天周叫管理员阎某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了会议，突然扩大了原定传达范围。19日上午，独立师部分单位已经将精神传达到战士，再由战士、军代表散布给“百万雄师”的群众。

蔡政委说：“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言罢，群情激愤；牛怀龙师长、蔡政委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把愤怒引向王力。

他们又向8201机关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

对于周恩来18日在军区的讲话，军区擅自同意向下传达，一些部队领导故意挑动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的愤激情绪，是一个长期被忽视或有意掩盖的关键。毛、周辞世以后，主流舆论和众多的“文革研究”总是指责王力在水院泄露了所谓“四点指示”、造反群众宣传了所谓“四点指示”，激怒了对立面；几乎没有人真正愿意搞清楚，王力在水利学院说了什么，造反派宣传了什么，对立面为什么被激怒？

实际上7月18日（已是19日凌晨），谢富治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讲话，并没有传达或提到中央处理问题的精神。王力接着谢富治发表激情的讲话，也没有传达所谓“四点指示”；而是具体提出这样的几个方面：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从讲话全部内容看，王力在群众中没有泄露或公开周恩来的讲话内容，精神大意是在中央的原则范围里的。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这些讲话精神显然是支持、安抚与引导群众的；尽管头脑发热、不可一世的王力支持造反派的情绪和话语锋芒毕露，也实际上促使了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抗议与对抗。就在王力还算是“武汉事件”的“英雄”的时候，周恩来就给文革小组人员说：王力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闯了大祸。本来是要先作陈再道的工作，再到群众中去，结果王力不听，去群众中讲话了。

文革以后，中纪委在审查谢富治问题的报告（中发〔1980〕77号，1980年9月）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赴武汉，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步骤和方法做了明确指示，交代谢富治、王力等人，对群众组织不要作倾向性的表态，要协助武汉军区做好部队和群众组织的工作，要实行大联合。但是谢富治同王力等人七月十四日到武汉以后，背着军区党委，私下四处活动，支一派压一派。七月十八日深夜，他们到武汉水利学院，公开吹捧‘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宣称‘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而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当成‘保守派’，

致使矛盾更加激化。这就酿成了所谓‘七·二〇事件’”。对于此，该报告文件的附件十一“谢富治参与制造武汉‘七·二〇事件’”里有王力自己在对中纪委的交代证言（1979—4—13），在审查中，他退而承认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谢富治和王力到水运（按，系‘利’之误）学院大讲支持与‘百万雄师’对立的‘钢工总’‘钢二司’……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都是支持一派，反对代表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另一派，激起了武汉爆发‘七·二〇’波澜壮阔的革命行动。在武汉问题上，我违背毛主席路线，谢富治和我是一个路线”。

19日上午，除了造反派在武汉三镇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院讲话录音，并没有任何人在街上宣扬什么“四点指示”，两派群众都不知道什么具体“指示”。最先提出问题并发难者，就是独立师的人，是他们把中央精神有组织地传达到在汉干部、战士，再迅速散布到全社会：

军区秘书科揭发说（26）：“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按：此时谢富治、王力正在传达中央的精神），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军区机关同志的证言是非常重要的。

此时，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师长继而也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6时左右，8201部队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战士的工作。独立师的副师长、副政委去到军区大院，却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机关人员：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2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和蔡在师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了动员，又到四楼动员。蔡还未讲完，院里就起哄了，要去冲军区。

今天访问“百万雄师”的领导骨干（27），回忆问题究竟如何爆发的，章迪杰如实说：“‘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王少荣说：“上街武装游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因为‘百万雄师’当时在党内、党外都是大多数，承担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中央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这么做既是反弹，也是叛逆。当时如果知道（‘四点指示’）是毛主席说的，‘百万雄师’是会绝对服从的”。当年“百万雄师”头头的这些反映和认识是相当客观的。

23时半，8201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此时，已经有200多独立师的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六台独立师的宣传车大喊大叫，指责所谓“四点指示”，半个晚上跑遍了武汉三镇……对此异常行径，独立师的干部当时就提出质疑和意见：19日24时许，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19日晚上，（师）370医院听说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师部回电承认。于是医院大批工作人员便冲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湖北军区后勤部政委于某在夜12点带领3个人到医院传达军区的指示，竟遭到一些病员和工作人员围攻和毒打。许多人叫嚷：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等等。

这些都反映出了当时独立师机关和基层一些干部极端暴烈的情绪。

事件平息后，独立师干部分析、揭发说：“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在一天之内将总理和王力同志的指示贯彻下去，在传达时，按其所需断章取义，尽力歪曲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挑起部队、

‘百万雄师’‘公检法’对首长的不满……”

另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是（28）：就在19日陈、钟军区首长已经按中央调子认错，起草、印刷公告，去释放造反头头时，有人让“省直联司”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接去武昌洪山宾馆，告之：毛主席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他们要找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亲自反映“百万雄师”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意见。不过后来他们没有直接去找寻毛、周，而是与独立师人员在军区食堂共同商议，具体行动是找王力、谢富治理论；随后，军、民行动人员就闯进了东湖宾馆。这是事后调查和文革以后平反该事件时，外界并不知道的实际情况。“百万雄师”高层，在揪斗王力之前，业已知道毛泽东就在东湖。

到目前为止，人们并不清楚是何处的对弈高手，明知毛、周在指导处理武汉问题，却“项庄舞剑”、顾此言它，引导狂怒的军人和群众：绕开“土相”，拥“兵卒”、挟持“马”别“马脚”，狠狠地将了毛泽东主席一军。（29）

实质上，东湖弄剑，意在毛公，用意旨在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 ◇ 事件发生的经过

##### ◆ 策划揪斗王力，冲击东湖宾馆

凌晨，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8201作战科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专揪王力指挥部”，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百万雄师”当事人回忆（30）：19日晚上10点左右，“百万雄师”总站二号头头杨道安叫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联络总站：“快上来，去军区”；到达军区大院，在食堂召开会议，杨和另一头头孙德洲主持，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汪次日在批斗现场录下了全过程。

和“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一起回忆事发经过（31），章迪杰（其常委、联络部长）说：“7月19日晚，我们在3506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常委、作战部长）、余均才（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竟有无‘四点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是谢敏华（政委、作战部长），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当时总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零’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8201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

显然，“专揪”行动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一些人组织策划的。

当时一个据说是8201部队的连指导员将一字条递交给“百万雄师”头头，字条书有“‘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是叛军”，公然造中共中央的谣，欺骗、煽动群众。

俞文斌（“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说：“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关于“‘七·二零’揪王力，8201部队的人很坏，不听招呼，跳到桌子上，打人，都是他们干的。有人打了王力，并把他架走，把事情搞复杂了。但‘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武汉军区军训部副

部长李良应该很清楚这些事情“。(32)

7月20日零点三十分，武昌公安局14人，冲击东湖客舍北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赶到北门阻拦。他们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独立师干部）开的介绍信，说“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闹事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在大门内100米处，双方对峙下来。

王振英立刻报告中央警卫团，汪东兴通知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赶到北门。王科长又电告钟汉华，钟已入睡，王强烈要求钟立即采取措施，秘书才去传达，但始终未有回音。王又急忙给军区值班的首长报告，要他电告军区领导，立即调8199部队来。

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你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你们先回去。但来人硬往里面冲。凌晨3点左右，8199的张昭剑政委奉军区之命带了一个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往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8201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8201卫兵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百万雄师”属下的“园艺军”按“专揪”统一策划，受命控制南山宾馆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在统一调度下，“园艺军”东湖分部雷某带一车人，从北门冲击宾馆，众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没有找到谢富治，雷就带领宾馆内的彭、唐、毕、王等十余人，向西越过第二道岗位，率先冲入百花院落。随后，集结在武重一带的“百万雄师”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一辆同武昌公安分局的结合，封锁北门，其余四辆冲进西大门，他们不听哨兵的警告，反而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包围了谢、王的住房，要见谢、王。在谢、王指责下，有人说：“我们不是来揪你的，是请首长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有人叫“不出去”，“谢富治、王力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扬言要揪王力去军区，要与谢、王拼到底。谢出来：“我就是谢富治”，又说“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一些群众自觉理亏，悄悄退出，还有5、6个仍在纠缠。

到四点多，谢富治叫军区曾秘书叫陈、钟来百花二号。陈进门就说“靠你们做工作罗，我是无能力了！”继而，陈再道提出到外面去谈。谢穿好军装，主动提出接见这些人，独立师张守本带领警卫将冲进的群众组织好坐在草坪上，谢出大厅后门在草坪上谈话，谢出来和群众交谈解答问题后，气氛变得较为融洽。王力也换上军装向草坪走去，坐在谢身边。

大家正在谈话，五点四十分，从西门又冲进一群“百万雄师”，径直向二号楼谢、王住房冲去。他们手持长矛、匕首、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有人居然戴个大口罩。接着，又冲进来8车8201、8199军人和军事院校学员；端着冲锋枪的8201军人，枪口直对谢、王。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又窜到草坪，挥拳就殴打陈再道，陈被打倒在地。王力见势不好，跑回房里；钟汉华也忙跑到一个地下室。军人将王力抓了出来，激愤的军人和群众蜂拥谢、王，愤怒殴打王力。张根成、北航学生和他们讲理，遭到毒打。问题发生后，独立师负责警卫的秦堂春、吕宗贵、蒋建隆分别打电话向牛、蔡报告，但却找不到牛、蔡，只好向司令部值勤室报告，并要求他们找牛、蔡到东湖处理问题。

北航学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车。汽车向军区大院开去。张根成紧跟大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王力同志要犯大错误。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来的代表”！听张回答说

“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人员”，军人把张也拉走；北航女红卫兵尹、胡被 8 2 0 1 战士和“百万雄师”带走。牛怀龙师长当时就在西门，王科长忙叫来了牛阻止事态发展，牛到绑架王力的车前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自己也随部队驱车赶到军区大院。

谢富治赶去搭救王力，路过消防队门口，消防队是属于公安系统的，其“武汉公安”人员居然说：“谢富治来了，谢富治是个大坏蛋，抓住他，揍死他，赶快拿刀子……”！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